

# 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

## (1938—1944年)

莫子刚

---

**内容提要** 吴鼎昌主黔期间,贵州虽已成为抗战大西南后方的中心地带,但其鸦片烟祸仍然十分严重。为了推动贵州的抗建工作,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国民政府采取了“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按期清缴鸦片烟土”,“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带头示范”以及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等诸多政策措施。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虽然是在民族意识高涨、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较大成功的,但史实也表明,贵州省政府的禁政以及吴氏本人的积极倡导、悉心筹划和严格督责等作风也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因素。

**关键词** 吴鼎昌 贵州 禁政 鸦片 烟祸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民国时期贵州鸦片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为数不多<sup>①</sup>,这些文章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不足之处亦明显存在。抗战时期,吴鼎昌在贵州的禁政搞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已

---

<sup>①</sup> 这些学术战果主要有杨开宇的《近代贵州的鸦片流毒》、李隆昌的《国民政府的禁政》、蒋德学的《民国贵州的烟毒危害及其影响》、俞菲的《鸦片——贵州历史上毒患的根源》以及秦和平的《有关30年代中后期贵州禁烟运动的由来及其认识》等论文。它们分别发表于《贵阳师院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1期;《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1997年第6期;1998年第6期;2001年第3期。

有的学术成果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或一概否定。笔者认为,鸦片烟祸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展经济,进行“抗建”的拦路虎,完成好禁政成为不可或缺的前期准备工作。因此,研究本题不仅有助于研究吴鼎昌本人,更有利于探讨抗战时期西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 一 主政前夕的贵州烟祸

吴鼎昌(1884年——1950年),字达铨,四川成都人,清末秀才,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回国后,主要活跃于金融界,逐渐成为20年代北方主要财阀之一。1926年与他人创办新记《大公报》,任社长,并在其副刊《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系列的社论文章。这些文章中即有涉及鸦片问题的内容。例如,他在其名著《中国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耕种土地时,“鸦片及其他妨害民食之产品应行严禁。”<sup>①</sup>抗战爆发前夕,吴氏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委员等职。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于1937年底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命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后来,又兼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省保安司令和军区司令等职务。吴氏对于自己被派往贵州主政,实有点始料不及,但国民政府之所以如此安排,是颇有深意的,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想让他开发建设贵州,把贵州建设成后方的粮食基地和兵源供应站。想到黔省财穷民困、百废待兴的状况和自己肩上的重担,到贵州后

---

<sup>①</sup> 吴鼎昌:《中国新经济政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66年版,第39页。

的吴鼎昌心情十分沉重：“予到筑时，正岁尾年头，国事艰危，客居孤寂，深夜一灯，往往不得成眠。”<sup>①</sup>

吴鼎昌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抗战前夕的贵州，虽然自1935年以来经国民党中央派员治理近三年，但各方面的进展不大：言政治，制度不健全，吏治腐败；言经济，除了公路交通略有发展以外，其余建设甚少；言教育，亦还停留在起步阶段。<sup>②</sup>单就禁政来说，虽然这三年贵州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奉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把全省分为四期按区域进行缓禁，因而实际上抗战前夕的黔省鸦片烟祸仍然十分严重：无论是已明令禁种的其它地区，还是剩留下来做为“缓禁区”的黔西22县份，种、吸、运、售烟等丑恶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东路，因罌粟的广泛种植，1936年、1937年两年度的鸦片产量都远远超过往年。<sup>③</sup>都匀县城共2万人，而吸食鸦片烟者，就有3000人之多。<sup>④</sup>三合县的人们吃鸦片“好象家常便饭，有时从街上走过，闻到一股鸦片的气味”。<sup>⑤</sup>在西路，“从贵阳往西，一直到黔省的西境，在公路旁、在深山中随处可见烟苗的美丽姿容”。<sup>⑥</sup>镇宁县“染芙蓉癖者遍于城乡，几占全县人口半数……以户计者，有烟具之家

---

① 吴鼎昌：《花溪闲笔》，贵州印刷厂印刷，1941年版，第7页。

② 参见茨青主编：《十年来之贵州》，《贵州晨报丛书》第3种，1937年版，第23—46页。

③ 《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下卷，第324页。

④ 吕东明、许国华编：《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

⑤ 《中华评论》第2卷第6期，1939年8月13日出版，第283页。

⑥ 《新新新闻》1938年11月19日。

占百分之七十”。<sup>①</sup> 安顺因为鸦片而“商业极盛”。<sup>②</sup> 平坝县的农业“别无作物,全是罌粟”<sup>③</sup>,罌粟花盛开,表示全县的农作物已经成熟。在西南一角的兴义,“1921年到1938年为其鸦片市场极为活跃的时期,全县大种鸦片,无论坝地、山地、干田、濫田、房侧屋后,只要有点空隙,都种上芙蓉”。<sup>④</sup> 在黔北,遵义县乡间的烟民竟达50%。“四面山附近80户人家中,只一家不吃鸦片”。<sup>⑤</sup> 川黔路上,“红灯笼到处悬挂,无处不是瘾者之‘雅室’”。<sup>⑥</sup> 另据当时内政部查禁种烟专员邓棠青估计,1938年前后散存于贵州民间的烟土至少有15万担。<sup>⑦</sup>

鸦片烟祸的广泛盛行,给当时贵州带来了诸多危害。首先,增加了社会动荡不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抗战后方的统治秩序:罌粟种植和生产既使粮食减少,灾荒濒临,又使丑恶势力为追逐鸦片的高额利润而相互冲突仇杀。“民有饥色饿殍之叹者,罌粟之害累也……比户因得种植其利固厚,借得彼失此禾稼减收,而濡染此毒者至十室而九”。<sup>⑧</sup> 贵州与三土,实结不解之缘。三土者,土匪、土豪与烟土。有烟土者必有枪,劫风一起,或持枪掠夺他人烟土,或保

---

① 蒋德学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46页。

②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9页。

③ 《国民贵州人物·史料辑录》,贵州社会学院图书馆编印,第1辑,1985年版,第90页。

④ 政协兴义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兴义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91页。

⑤ 吕东明、许国华编:《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

⑥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13页。

⑦ 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8页。

⑧ 吴宗同:《湄潭县志》,《食货志·序》,光绪二十五年版。转引自《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3期,第75页。

获自有烟土,均为患之厉阶。至烟土与贪污关系,更不待言”。<sup>①</sup>“本省近年劫案十有八九均为鸦片,故鸦片苟不彻底禁绝,则本省土匪恐无减少之日”。<sup>②</sup>其次,摧残了民众的心身健康,助长了贵州社会各阶层的腐败堕落之风,使民众自私自利感增强,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愫削弱。遵义县“居民现皆消沉于烟酒赌博之恶劣嗜好,置正义而不顾,呻吟于贫乏而堕落的生活”。<sup>③</sup>一些烟民不以吸烟为耻,反以吸烟为荣,在烟民登记中以岳飞、曹操、赵子龙等古代英雄人物自居<sup>④</sup>,当时贵州因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许多居民本来“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sup>⑤</sup>,这种自甘堕落、自我陶醉的状态无疑使他们与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愈来愈远。再次,造成了人力、资金和其他资源的巨大浪费,妨碍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就人力而言,烟民们吸食鸦片后,往往精神变懒,身体变差,既难以胜任劳动生产,更不能当兵打仗。例如,竺可桢初到贵州时发现,轿夫们“每行10里或15里就得停下来休息,过足烟瘾之后,才有力上路”。<sup>⑥</sup>按照国民政府兵役法之有关规定,适龄青年服兵役的身高体重必须在1.5米和48公斤以上,但在贵州由于卫生条件太差,“烟毒普遍盛行……一般适龄壮丁年龄虽已合格,而检验身体结果,恒在规定标准之下”。<sup>⑦</sup>就资金而言,大量的社会游资被耗于鸦片之上,而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却很少有人愿意经营。

① 谭克敏:《民政十讲》,《贵州大刚报》社印行1946年夏版,第74页。

② 《贵州日报》1942年9月23日,第3版。

③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15页。

④ 政协贵阳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60页。

⑤ 《大公报》(重庆版),1938年3月14日,第4版。

⑥ 吕东明、许国华编:《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

⑦ 贵州省临参会秘书处编:《贵州省临参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记录》,1943年版,第97页。

如在遵义一些地方,瘾民们每日吃饭只化0.2元,而吸食鸦片则需1.4元。<sup>①</sup>另据调查,1937年的安顺县“各项工业产品售价极贵,如铁器之本地产品,售价往往高于成都运来之货”。<sup>②</sup>推究其原因,除了币制混乱、商人哄抬价格以外,一是由于“当地人民普遍染有不良嗜好,性情极懒,工作效能极低,成本因此增高”。二是由于经营鸦片贸易容易获利,人们多不愿意从事锻铁等劳苦而薪少的工作,故“召集工人困难,不得不出高价以罗致之”。<sup>③</sup>在遵义,白耳、山丝等传统土特产,历来产况较好,但自鸦片流行后,“乡人但图目前利益……均执中于鸦片之种植”,这些物品的出产也日益减少。<sup>④</sup>总之,鸦片烟祸的盛行特别不利于贵州国民政府抗建工作的开展。蒋介石指出:“一个民族的灭亡,往往不是单纯的被别的民族用武力或政治的力量征服所致,而是由于这民族本身堕落腐败的结果……鸦片的危机远胜于外侮,我们民族能否复兴……最重要者就是看我们能否铲除烟毒的祸害。”<sup>⑤</sup>

## 二 主政后的禁烟举措

对于上述鸦片烟祸的危害,吴鼎昌是有深刻认识的。首先,他认为禁政的成功与否是建设和发展贵州的关键。在吴氏看来,“有贵州即无鸦片烟,有鸦片烟即无贵州”,“烟毒是贵州最大的病根,它造成人民孱弱,文化生产两俱落后的现象”。<sup>⑥</sup>因此,贵州人民

① 吕东明、许国华编:《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

②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11页。

③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11页。

④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12页。

⑤ 贵州全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编:《抗敌》第13期,1940年12月1日版,第6页。

⑥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吴主席讲演稿存》第3册,1939年版,第143页。

要想进行生产建设,发展社会经济,使各方面都取得进步,就必须抓住抗战时机彻底剪除鸦片,使禁政一气呵成。否则,若让烟毒继续遗留,则“有贵州等于无贵州,有政治等于无政治”。<sup>①</sup>他指出,“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是一件最根本的‘除旧布新’工作,抗战是‘除旧’,建国是‘布新’……至就贵州地方而论,其最大的除旧工作就是禁烟”,而布新就是开发建设贵州。<sup>②</sup>他把禁绝鸦片后的贵州比作一张洁白的白纸,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在上面描绘出美丽的蓝图。

其次,吴氏把禁绝鸦片看作是贵州儿女参加抗建工作的先决条件。贵州历史上有著名的“双枪队”,此时进行抗战活动,还能照旧依赖这样的军队吗?吴氏十分清楚禁烟与兵役及抗战的密切关系。他说,“贵州因为交通的不便,环境的限制,物力之能贡献于国家的,无可讳言的比各省要少,唯一的办法,只有以人力补充物力的不足。”<sup>③</sup>这也就是说,贵州人民参加和支持抗战的主要途径就是服兵役,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格士兵,这是贵州人民义不容辞的义务。但要尽这一义务,就必须注意卫生,加强体育锻炼,戒除鸦片烟毒,然后再接受教育与训练,养成各种“抗战建国”的技能。“禁种鸦片,是保种强国的要图”,“解除烟禁,便可灭种”<sup>④</sup>,如果让“鸦片烟毒把贵州人民身体毁坏了,衰弱了,没有了强健的身体,如何能去抗战?如何能去建国?”<sup>⑤</sup>

基于上述认识,吴鼎昌表示:禁烟是他的“职责所在,对于这样

---

① 吴鼎昌:《花溪闲笔》,贵州印刷厂印刷 1941 年版,第 20 页。

② 贵州省政府秘书厅编:《吴主席讲演稿存》第 3 册,1939 年 4 月版,第 143 页。

③ 《新经济半月刊》第 10 期,第 243 页。

④ 《贵州日报》1942 年 12 月 9 日,第 3 版。

⑤ 贵州省政府秘书厅编:《吴主席讲演稿存》第 2 册,1939 年 4 月版,第 69 页。

的要政,自然惟有以最大的决心,力排万难,以求贯彻”。<sup>①</sup>主黔期间,他不仅主持制颁了近20个禁烟禁毒法规,还下达了许多训令和手谕。他自己说,非遇紧急情况,一般不使用手谕形式。但在禁政方面,却使用手谕达10余次之多,例如,手谕彻查公务员吸烟,手令各级军政人员贯彻根绝种烟、肃清私土两大工作,手令查禁制售烟具赌具,手令各级军警及各地行政长官密查包庇烟赌者,手令各县长彻底肃清私设烟馆。等等。

具体说来,吴鼎昌主黔期间(1938—1944年),大致采取了以下禁烟政策和措施:

#### 第一,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

吴鼎昌上任伊始,即按照前任的既定计划,制颁了《贵州全省厉行禁绝鸦片实施办法纲要》,作为“今后办理禁政之准则”。<sup>②</sup>《纲要》要求把剩下的本该缓禁的黔西22县之罌粟于1938年10月底以前禁绝,这样,从此以后贵州省没有哪一个县可以再种植罌粟了。

就所有的禁烟政策来说,“禁种为治本,禁运禁售为治标”,只要禁种成功了,就斩断了吸、运、售鸦片之来源,但在贫困落后的贵州要真正做到前者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自清末以来鸦片问题的久悬未决,不仅使贵州民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意识上养成了一种对鸦片的严重依赖心理,而且使贵州历届政府在财政上形成了以鸦片特税为主要开支的畸形经济状态,禁绝鸦片就意味着财政亏空、经济破产。1936年贵州省的鸦片税收约占财政总收入的4/5<sup>③</sup>,

① 贵州省政府秘书厅编:《吴主席讲演稿存》第3册,1939年4月版,第14页。

②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1990年第3期,第39页。

③ 况浩林、杨丽琼:《近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鸦片毒害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40页。



1937年贵州全省的财政收入不到720万元(法币),而鸦片特税约占其中的1/3。“若鸦片禁种,特税无着……省预算却无法成立”。<sup>①</sup>研究贵州经济颇有造诣的张肖梅博士指出:“一旦特货税协款因禁烟战功而停止,则黔省政府将立陷于无法支撑局面。”<sup>②</sup>数年来,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把贵州作为“缓禁区”,迟迟未下解决贵州鸦片问题的最后决心,就是贪恋鸦片的丰厚利润,顾虑到禁烟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贵州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的维护问题。过去贵州对外贸易,纯粹依赖鸦片,每年收入以千万计。现在鸦片逐渐禁绝,外货照样输入,而内部却无以抵挡,市场经济萎缩,金融周转不灵,这是多么值得注意的”。<sup>③</sup>因此,为了补偿“人民遵令禁种之损失,树立全省经济开发之基础”,吴鼎昌政府采取了如下禁种后抵补措施:颁布《黔西等22县农业抵补办法大纲》,要求黔西22县和全省其他各县改种谷麦、蔬菜,“并辅以棉麻、茶桐油、果树、竹蔗、烟草等物”。<sup>④</sup>允许农民在规定期限内利用罌粟种子榨油或向县政府请求掉换积谷或杂粮种子;规定所有荒山荒地由禁种区域的农民尽先领种;亲自邀请中国农业研究所负责人沈宗翰先生出面在贵州成立农业改进所,考察各县土质,进行试种试验,指导农民生产;责成各县县长和农改所商定办法购买作物种籽,免费或降价发给农民;要求农业合作委员会向农民长期贷款,解决生产资本;成立农产品加工促进会并农业仓库、面粉厂、制糖厂等,保证农产品销路,免除农民后顾之忧;规定农产品价格高于鸦片售价,使改种的烟农有利可图。<sup>⑤</sup>此外,还大

① 吴鼎昌:《花溪闲笔》,贵州印刷厂印刷1941年4月版,第35页。

②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7月版,第8页。

③ 参见茨青主编:《十年来之贵州》,《贵州晨报丛书》第3种,1937年版,第23页。

④ 《大公报》(重庆版),1938年7月8日,第3版。

⑤ 《大公报》(重庆版),1939年1月8日,第2版。

力开发各种矿藏,发起造产运动,增加财政收入,增强经济活力。

为了严防偷种罂粟,吴鼎昌强调对禁烟等要政要“三日一查,五日一问”<sup>①</sup>,采取了严查和武铲措施。1939年初全省禁种后,他“深恐人民偷种”,先后要求省政府制颁了《贵州省1939年肃清偷种鸦片办法》、《消灭本省本年各县民间偷种罂粟方法》、《彻底查禁种烟》、《彻底禁止偷种烟苗办法》等法令法规。按照法令精神,从1939年起在全省各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检查,并形成了一种按季节、按规定、各级官吏分工合作、严勘密查烟苗的经常性制度:每年10月—11月烟苗下种期,由联保甲长负责收缴罂粟种子,并要求出具担保境内不再种烟的切结;每年12月一次年1月烟苗出土期,由各县县长勘查并负责铲除烟苗;每年10月一次年5月,由各区专员巡逻督察<sup>②</sup>,全面检查过关。除这种固定性的全省范围的检查外,省政府还时常组织一些临时性的检查,如派员协助中央查烟团的检查工作,吴鼎昌自己和省府各大员巡视中的即兴检查等等。在查种过程中,一旦发现烟苗,则种户处死,田土没收,所有有关的官员撤职治罪。对那些敢于聚众抗拒的土豪和禁政难行的地区,吴氏主张“不应煦煦为仁”,要求将“种烟地点、种烟亩数、匪首或估抗首要姓名、助势或匪徒人数、拥枪数目、县政府未能执行查禁情形,详细列表报省”<sup>③</sup>,由省政府调遣驻军、警察、保安团队等武装部队实施武力铲除。

## 第二,亲兼督办,努力肃清烟土

禁运、禁售两项事宜,在1939年以前由禁烟督察处贵州分处和贵州缉私专员事务所负责办理。1939年8月成立了督办贵州

① 吴鼎昌:《花溪闲笔》,贵州印刷厂印刷1941年版,第167页。

② 《大公报》(重庆版),1940年9月27日,第3版。

③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1998年第2期,第33页。

省肃清存土事宜公署即禁烟督办公署,由吴鼎昌亲自兼任督办。在吴氏的主持下,公署对全省私存烟土进行了全面清查和收缴:按照中央颁布的《肃清私存烟土清查登记实施细则》,规定从9月份起,以3个月为期对全省私存烟土“划定单位挨家挨户”地进行清查登记,并由各区联保主任或保甲长督率存户将存土先行送交附近仓库,而后集中解往贵阳、安顺两处“公栈”,最后由督办公署按每两3角(法币)的价格予以收缴。<sup>①</sup>烟土收缴上来后,吴鼎昌把其中的137万两送交重庆,替黔省换回了200万元特种补助费。<sup>②</sup>禁烟督办公署撤销后,“查缉运售之责”则由省府直接办理。1940年吴鼎昌又下令以5个月为期在全省进行三次私土总缉查,调动大批军警配同各县县府四出搜罗散落于民间的烟土、烟灰、烟具。并先后在关岭、平越、遵义、毕节、贵阳、盘县、安顺、独山、铜仁、镇远等10处设立烟毒查缉所、检查站等机构。<sup>③</sup>此外,贵州省政府还分别与湘、桂、川、滇等邻省订立《联合禁烟实施办法》,会同它们不分畛域地对边区连界各县进行缉烟。

在缉烟过程中,吴氏处理了不少趁机中饱私囊的不肖官吏。最典型的例子是1940年吴氏较为宠爱的关岭县县长包和麟,在送交任内查获烟土之时,仅因多出烟土三钱,就被撤职查办,并判刑2年有余。<sup>④</sup>

### 第三,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的带头示范

禁吸实际上是一项重新塑造人的长期性工程,因此“尤应兼程

① 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民国二十四年——民国二十九年》,(台北)“国史馆”印刊1986年版,第315页。

② 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第36页。

③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1990年第3期,第67页。

④ 贵州省《政府志》编辑部提供:《吴鼎昌施政方针》(未发表),第3-4页。

前进”。<sup>①</sup> 抗战时期吴氏政府采取了很多禁吸措施,主要有:(1)取消土膏行店和各县售吸所。吴氏认为,贵州是产烟区,烟土“家藏户有,烟民吸土不必出诸土膏行店”,土膏行店和各县售吸所的存在,不但对“税收无益,而于戒烟有害”<sup>②</sup>,全然不符合贵州省情。因而他不顾禁烟督查处贵州分处的阻挠反对,毅然呈准中央,下令停办全省所有的土膏行店和各县售吸所。(2)重新办理烟民登记。1938年11月吴鼎昌下令全省整理保甲户口,同时责成编整人员附带举行了烟民登记,登得烟民257228名。<sup>③</sup>使政府掌握了以后戒烟的基本依据。(3)根据不同年龄实行分批传戒并规定不同的戒吸期限:30岁以下者3个月,50岁以下者6个月,50岁以上者9个月,65岁以上者1年<sup>④</sup>,期满戒断与否由当地卫生院所调验确定。烟民戒吸后,责令保长、甲长等随时察看密报,并由县政府逐月抽验。(4)按照每县卫生院所的规模大小规定其戒绝烟民的指标。如1940年务川县每月戒绝的任务为100人,全年为1200人。<sup>⑤</sup>思南每月50人,全年共计600人。<sup>⑥</sup>完不成任务者唯县长是问。(5)重视壮丁戒吸。对其它条件都合格的吸烟壮丁,先强征入伍,再勒令戒除,杜绝壮丁借口吸烟而逃避兵役的现象。(6)下令各县设立烟民习艺部和烟民工厂,收容贫苦烟民,使他们既戒了烟,又学了谋生技能。

①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1990年第3期,第38页。

② 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民国二十四年——民国二十九年》,(台北)“国史馆”印刊1986年版,第323页。

③ 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民国二十四年——民国二十九年》,(台北)“国史馆”印刊1986年版,第273页。

④ 谭克敏:《民政十讲》,《贵州大刚报》印行,1946年版,第75页。

⑤ 务川县自治县民政局编印:《务川民政志》,1995年版,第195页。

⑥ 政协铜仁地区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铜仁地区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5页。

“公务人员,既为民众表率,即当以身作则”<sup>①</sup>，“凡我同僚,务各善体斯旨,切实奉行,无论何人,倘有违反,定即如令处置,决不宽容”。<sup>②</sup>在戒吸方面,吴鼎昌尤其注重公务员的带头示范作用,要求同僚之间互具切结,相互保证和监督;多次手谕要求彻查,并规定复犯吸烟者,“除本人免职或解聘、依法惩治外,其直接主管人员连带受免职处分”。<sup>③</sup>在手谕中,吴氏亲自对“各级官员的上级直接主管人员为何人”的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此外,针对官吏们相互偏袒的状况,吴氏政府还订立《逐级检举办法》,鼓励广大民众检举告发,扩大政府的监控范围。

在所有的公务人员中,吴鼎昌尤其重视保甲长的“戒吸”问题。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的基层统治网,保甲长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禁政和其他法令的贯彻执行。诚如吴氏所说,“省主席生命系于县长之手”,“县长生命系于保长之手”,“倘若区保制度不健全,保长、甲长没选好”,则“不但任何法令无法实施,甚且任何善政皆可恶化”。<sup>④</sup>因此,吴氏规定了三项选用保甲长的起码条件,即:“不抽烟,不敛钱,不庇匪”。他认为,只要做到这三点,“即使才具稍为差一点,也可以用”。他相信,这样的人一定就是“一个很决断、很有毅力的人”。如果所有的保甲长都如此,整个贵州就不会被“黑化、腐化和恶化”了。<sup>⑤</sup>

就吴鼎昌自己来说,他不仅勤勉工作,而且洁身自好。抗战进入艰苦阶段后,为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抗战,贵州省政府发起了禁酒运动。吴氏对酒素有嗜好,但自“禁酒令”下达后,他以身作

① 贵州政府秘书处编印:《两年来贵州行政》,1940年版,附录(四)。

②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1990年第3期,第47页。

③ 贵州政府秘书处编印:《两年来贵州行政》,1940年版,附录(一)。

④ 吴鼎昌:《花溪闲笔》,贵州印刷厂印刷1941年版,第141页。

⑤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吴主席讲演稿存》,1939年版,第1册,第49页。

则,坚决戒掉了饮酒,嘱其夫人将家中余酒全部封存窖藏,并把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的龙云派专人送来的一大卡车法国名酒送往省卫生委员会,将其中能充药的白兰地酒等列单报省政府批准后制药,其余全部封存。<sup>①</sup>这种处置在贵州公务员中一时传为美谈,对他们的戒烟脱瘾发生了积极影响。

#### 第四,推进禁政,兼取宣传与刑罚之长

在禁政中,吴氏尤其注重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注重以宣传劝导的方式营造禁烟氛围。例如:多次颁布布告,反复宣明政府禁烟的决心和意义;利用“六三”(虎门销烟日)等纪念日,发起演讲活动;规定每周星期二为全省禁烟宣传日;要求有关部门编写禁烟半月刊等专门宣传品;多次嘱咐部下和请求到贵州考察的冯玉祥等人到处宣讲鸦片危害。<sup>②</sup>此外,吴鼎昌在各种会议上和其他场合也时刻不忘对官民的申诫,他要求部属要“向其亲戚朋友笑着、哭着、哀恳着劝其戒烟”,尤其希望教育界的小同学,“回到家去,要劝告自己家里或亲戚家里抽烟的人,立刻戒烟,笑着劝不成,哭着去劝,哭着劝不成,把烟具打掉来苦劝”。<sup>③</sup>

为了使一些重要禁令家喻户晓,吴氏政府把它们精缩成布告、传单、标语、口号,或交于边远农村工作团、戒烟巡逻队广为散发,或在各次检查之前到处张贴,或在召开各种会议之时广泛宣传。这些标语、口号之中既有对烟犯分子颇具震慑力者,如“栽种鸦片的枪毙”、“贩卖鸦片的枪毙”、“开设烟馆的枪毙”、“吸食鸦片的处徒刑,复吸的处死刑”等<sup>④</sup>,又有把禁烟与抗战联系起来,让人感到

① 徐茅、顾关林、姜天鹰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② 《中央日报》(贵阳版),1938年3月13日,第3版。

③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吴主席讲演稿存》,1939年版,第2册,第69页。

④ 《贵州日报》1942年6月2日,第3版。

烟毒非廓除不可者,如“鸦片烟是国民公敌”、“栽种鸦片等于汉奸”、“吸食鸦片就是自杀”、“肃清烟毒,创造新贵州”、“复兴中华民族要彻底肃清烟毒”。<sup>①</sup>等等。

其次,在刑罚方面,为了警醒官民,激活禁政,采取杀一儆百和联保连坐之法。吴鼎昌深知要搞好禁政,“决非一纸命令,几回巡视,数次讲演所能奏效”。<sup>②</sup>还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1941年4月他亲自制定了《处理烟犯四项标准》,加重处理烟犯的量刑程度:持有鸦片烟者,罚款500—1000元;吸食鸦片初犯者,处2年徒刑;持烟意图贩卖者,处以10年以上的徒刑;其余凡贩运鸦片、开设烟馆、吸食复犯者均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sup>③</sup>1941年11月省府订立《逐级查禁办法》正式把肃清烟毒事项列入联保连坐范围。1942年1月5月又分别制颁了《厉行禁烟五项办法》和连坐法的处分办法和执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禁烟联保连坐法。此法规定:凡一家违犯烟禁,其同结各户户长、甲长、保长、区长(镇长)、联保主任、县长及有关警察宪兵,“均概行依法连坐”,即使“确不知情者”,也在所难免。<sup>④</sup>

### 三 禁政的成效与局限

史实表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取得了一定成就:首先,禁政使贵州鸦片产量猛减,农作物产量大增,种、吸、贩烟现象受到有力遏制。禁种方面,据当时官方统计,1938年的贵州鸦片产量已

① 《贵州日报》1942年5月18日,第3版。

② 吴鼎昌:《花溪闲笔》,贵州印刷厂印刷1941年版,第144页。

③ 《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4月12日,第2版。

④ 贵州政府秘书处编印:《两年来贵州行政》,1940年版,民政,第22页。

由 1935 年的 3185 万余两减至 39.8 万余两。<sup>①</sup> 1939 年春,“各乡镇烟苗铲去 90% 以上”。<sup>②</sup> 各省之中禁烟后改种农作物情况以“贵州成绩最为显著”。<sup>③</sup> 到 1940 年全省已有 3100 多万亩耕地完全改种谷物。<sup>④</sup> “由于禁政的收获,使粮食生产自然随之增加”,1945 年贵州全省农作物产量较诸 7 年前增加了 1/3。<sup>⑤</sup> 1943 年全省麦类种植面积和产量同 1937 年的相比分别增加了 72.23 万亩和 169.95 万石。<sup>⑥</sup> 此外,菜油、麻、棉花、蓝靛等传统经济作物之产量也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如油菜,1936 年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为 306.3 万亩和 239.6 万市担,1944 年则为 440.7 万亩和 302.7 万担。<sup>⑦</sup> 再如麻,1937 年的产量仅 2.6 万担,1944 年则猛增到 110.3 万担。<sup>⑧</sup> 禁吸方面,经过这次禁烟,大多数民众已经认识到“洋烟为毒物”<sup>⑨</sup>,吸食之风已大有好转。1943 年 5 月 18 日的重庆《大公报》如此报道:老烟民已大都戒尽,“新染烟癖者,已绝无其人”,“辽远穷僻之地,闻有少数吸食之人,亦已廖若晨星”。至于贩运兜售现象也被有力遏制,许多过去以鸦片贸易为业的商人纷纷转入民族工商业。<sup>⑩</sup> 短短几年里,铲除烟田数万亩,肃清烟土几百万两,无数烟犯被纷纷正法。据

① 《贵州省统计资料汇编》,1942 年版,第 207 页。

② 卢杰等编:《兴义县志》,第 6 章第 10 节,禁烟,第 67 页。转引自《贵州文史丛刊》,2001 年第 3 期,第 59 页。

③ 中国西南实业协会编:《西南实业通讯》,第 2 卷第 5 期,1940 年第 4 页。

④ 《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57 页。

⑤ 《大公报》(重庆版),1945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⑥ 《贵州省统计资料汇编》,1942 年版,第 207 页。

⑦ 《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 4 卷,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2 页。

⑧ 《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 4 卷,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3 页。

⑨ 《大公报》(重庆版),1945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⑩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1990 年第 3 期,第 102 页。



载,仅1940—1942年的3年里,全省就铲除烟苗1万多亩,缴获烟土近12万两。<sup>①</sup>另据《贵州日报》报道,1942年9—11月的3个月中,全省判决烟犯200余人。<sup>②</sup>总之,禁政基本取得成功并使贵州鸦片大省的形象发生了重大改变,无论是从贵州历史的纵向看还是与当时其他各省区的横向比,这次禁政的成绩是十分突出的。1943年春到贵州考察的蒋介石指出:“在吴主席的领导下,昔日遍地烟毒、人民面黄肌瘦的贵州,今日已变成了安乐和丰裕的天堂”,这是他“生平最快乐的一件事”,他说,如果拿贵州的成就来做标准衡量他省,则任何事业都可以成功。<sup>③</sup>蒋介石的话语虽然不可全信,但仍可作为重要参考。

其次,禁政为贵州最终摆脱鸦片的影响,发展社会经济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抗战以前,“贵州农业经济的‘周转’,民族工业的发展,商业交往的盈亏,财政收入的增减,无不取决于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消长”。<sup>④</sup>抗战时期的禁政使这种积重难返的鸦片经济状态逐渐得以改变。把鸦片税收竭力剔除之后,贵州省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补助收入,全省经济发展曾一度受挫。但长痛不如短痛,以这次禁政为基础和起点,在政府的倡导和人民的努力之下,贵州社会经济经过短暂而剧烈的造动变化之后,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崭新阶段。“言工业,……全省仅公营、民营大小机器工厂即达300家,他如酒精、橡胶、麦粉、卷烟……等工

①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黔政五年》,1943年版,民政,第26页。

② 参见《贵州日报》1942年9月5日,第3版;1942年10月6日,第3版;1942年11月18日,第3版。

③ 贵州省临参会秘书处编:《贵州省临参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记录》,1943年版,第12页。

④ 杨开宇:《近代贵州的鸦片流毒》,《贵阳师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第39页。

厂亦不下数百家,一时成为抗战后方一个有力的工业生产重心。言农业,则改良推广良种,试种美烟等经济作物,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等都有长足进步……粮食产量……基本保证了抗战时期贵州军需民食的需要。言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1945年仅贵阳市商业户即从1937年的1420户增加到5422户,商业资本亦从1937年的180万元(法币)增加到2.1亿多元。遵义、安顺、都匀、桐梓等地亦相继商号林立,买卖兴隆,盛极一时”。<sup>①</sup>抗战结束后至1949年底,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纵容、鼓励鸦片生产以支撑内战的政策,虽然贵州鸦片烟祸又趋严重,禁政日趋表面,社会经济又呈衰落,但与抗战以前相比,吴氏禁政在这些方面的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至少鸦片生产再也无力恢复到战前状况,地方势力再也不能公开以鸦片为其生存的经济基础与中央政府相抗衡,那种鸦片收入支配省财政和贵州人民整个经济生活的现象亦一去不返。

此外,这次禁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贵州民众的心理,使不少人一度改变了非鸦片勿能生存的陈腐心理和懒惰恶习,禁烟的文明理念或多或少地得到巩固和加强,贵州民众在禁政的洗礼中曾一度振作了精神、树立了新风,从而推动了本省的抗建大业。不论是出于自愿与否,贵州民众的身心确实已被这次禁政驱动起来,禁烟的积极性也有较大发挥。例如在1942年铜仁、松桃、台江三县联合铲烟的事件中,“人民畏祸自铲及相互查铲者至少”是政府所铲的3倍以上。<sup>②</sup>全省仅在1941年10月—1942年10

<sup>①</sup> 熊大宽:《贵州抗战时期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sup>②</sup> 政协铜仁地区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铜仁地区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5页。

月共计被检举出来上报的烟民即达 14738 人。<sup>①</sup> 1945 年初,即将接替吴鼎昌成为贵州新猷的杨森对记者如是说:“过去黔省居民染有嗜好者多习于晏起,懒于劳作,曾于每晨派人劝导,近来黔省一般情形已较前大有进步。”<sup>②</sup> 总之,抗战时期的禁政有利于贵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贵州禁政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成绩,无疑主要是由于当时民族意识高涨、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所致。正如吴鼎昌自己所说:“尤其是偏远的贵州,几年来得稍有进步,皆有抗战之功。譬如禁烟,如果没有抗战力量促进人民觉悟,便不会有今天的成绩。”<sup>③</sup> “任何新政令倘于其时机未到或已过时推行,往往用力多而成功少,若适逢其时则可不胫而走也。例如禁烟为贵州实行之最困难之事件,而一到抗战时机,便可一气呵成。”<sup>④</sup> 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甚至否认吴氏本人在禁政中的功劳。在他之前,吴忠信曾于蒋介石面前痛哭陈词地说,如果没有烟税收入,他决不回黔主政,对鸦片难分难舍。<sup>⑤</sup> 在他之后,杨森、谷正伦等或暗中包庇鸦片走私,或公开鼓励种植罂粟。<sup>⑥</sup> 与他们相比,做为封疆大吏,吴鼎昌在禁烟方面表现出来的热情和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也因此获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嘉奖。<sup>⑦</sup>他遵循中央命令,

① 曾俊候:《贵州省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建设厅的报告》,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1943年版,第11页。

② 《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月17日,第2版。

③ 贵州全省县政会议秘书处编印:《贵州全省县政会议纪要》,1941年版,第147页。

④ 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第57页。

⑤ 政协贵州省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3期,第60页。

⑥ 蒋德学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55页。

⑦ 蒋德学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第1卷,第257页。

适应时代潮流和贵州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抗战大势,广泛发动禁烟,对禁政有倡导之功;他针对贵州特点,悉心规划、想了不少办法,对禁政有筹划之劳;当阻力出现时,他反复训诫、坚决施行,对禁政有经营之苦。就吴氏禁政本身来说,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具有严密周详、实用性、操作性较强的特点:禁烟后补种等诸多措施,意在打牢黔省农业基础;利用禁烟罚金作禁烟经费,意在化废为用,尽量减低损失;让各级官僚相互具结连坐,意在使官官相监,层层负责,从领导上保证禁政开展;实行宣导和严刑相结合,意在宽猛相济,恩威并用,既广泛调动禁烟积极性,又最大限度地打击烟犯;实行武力铲烟,意在既造禁烟声势,又扫鸦片死角……总之,吴鼎昌既有禁烟决心,又有胆略毅力,复有良法美政,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抗战时期贵州禁政的上述成功。

遗憾的是,由于禁烟经费与人才的奇缺;时局动荡,各级地方官吏忙于征兵、征粮、征工等事务,无心或无力于禁烟<sup>①</sup>;鸦片生产获利甚丰,难以根除;以及禁政本身的缺点和不足(如缺乏监督与约束机制,导致要求勤查烟苗烟土的措施变成了贪官污吏们敲诈勒索、横行乡里、骚扰百姓的借口等等)等原因,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并没有达到吴氏及其政府所预期的目的:鸦片烟祸始终没能廓清,“偷吸者有之,偷贩者有之,偷种者亦有之”。<sup>②</sup>尤其是一些边远山区禁者自禁,种者自种,形成了“年年禁烟,年年种烟,年年铲烟,年年收烟”的景象。<sup>③</sup>抗战胜利后,此次来之不易的禁政战果既没有得到巩固,更没有得到扩大,反而日趋废

① 《贵州民意月刊》,第4卷,第4页。转引自《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3期,第54页。

② 何辑五:《禁政感言》,贵州省档案馆藏档案60全宗11414号卷。

③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1990年第3期,第105页。

驰。国民党政府的禁政从此一直徘徊于一种一波三折、反反复复甚至越禁越多的不良状态,这种状态直至解放初期才最终得到有力遏止。

(作者莫子刚,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3 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 9 月出版,1604 千字。该书所选论文 111 篇,分别就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与战后遗留问题、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与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抗战时期的少数民族等内容做了论述。